《学术界》(月刊)
总第279期,2021.8
ACADEMICS
No.8 Aug. 2021

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及其价值审视〔*〕

丁　浩，刘同舫
(浙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　杭州　310058)

〔摘　要〕哈维赋予社会正义历史情境特征,从理论基础和基本方向的角度明确了“空间解放”构思的规范性原则;依循超越激进思潮乌托邦理想、嵌入不平衡地理发展空间以及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基本思路,哈维以“空间解放”的思想生成、现实必然性和目标指引为主要内容展开了具体的构思过程;哈维的构思丰富了人的解放的空间意蕴、扩展了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内涵、彰显了构思方法的原则性,但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价值审视下,哈维在处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劳动分工的联结作用和社会正义的综合作用两组关系时存在逻辑错位与理论限度,其构思难以作用于社会空间秩序的实际变革。

〔关键词〕哈维;空间解放;构思;审视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1.08.015

“空间解放”在大卫·哈维的空间理论中具有独特的思想意蕴。[1]在解放政治学的现实语境中,哈维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批判性分析,对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的探索过程,都蕴含着构思“空间解放”的理论内容。在对“空间解放”的构思中,哈维以社会正义作为规范性原则。哈维语境中社会正义的特定评价机制及其与“空间解放”的共生关系为“空间解放”构思绘制了多重理论图景。在社会正义的规范作用下,哈维围绕“空间解放”的思想生成、现实必然性与目标指引展开了具体的理论构思,这一构思丰富了人的解放的空间意蕴、扩展了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内涵、彰显了构思方法的原则性。但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价值审视下,哈维的构思也显现出不足之处,主要表现为处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劳动分工的联结作用和社会正义两组关系时的逻辑错位。以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对哈维的构思进行价值审视,既有利于在揭示“空间解放”构思欠缺的前提下明确对哈维构思的理论认知,也有利于在展现构思不彻底性中把握哈维空间理论的当代价值。

一、哈维“空间解放”构思的规范性原则

为了克服资本积累逻辑对空间生产的支配,

作者简介:丁浩,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刘同舫,法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

〔*〕本文系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与国际认同研究”(19ZDA003)的阶段性成果。

哈维着力探求“空间解放”如何展开的问题。在构思“空间解放”的过程中,他通过对普遍性质和特殊性质两种类型正义理论的扬弃,明确了社会正义的历史情境性特征,其语境中的社会正义不仅和“空间解放”具有共生关系,而且构成了衡量“空间解放”构思的特定评价机制。

把握哈维的“空间解放”构思,首先需要理解社会正义的本质规定。哈维语境中的社会正义是他对资本积累逻辑中空间剥削、空间异化等现象进行价值反思的结果,是具有历史情境性的规范性原则。哈维指出,“我从倾向于把社会正义看作是永恒的正义和道德的问题,转变为把它看作是依附于整个社会中运行的社会过程的东西”。[2]在以过程的辩证法来分析社会正义过程中,哈维以“一反一正”的叙事方式表明了既定空间结构中社会正义的历史性质。就“反”的方面来说,哈维语境中的社会正义面临着两个方向上的理论混淆。普遍性质的正义理论在启蒙理性的推动下突出同质化的正义内涵,认为普遍适用的正义理论对建构社会具有基础性作用。特殊性质的正义理论主张正义的异质性,强调“正义观念根本不具有任何意义,除非在某个特定时刻,谁来决定他们所需要的意义”。[3]面对两个方向的理论混淆,哈维从“正”的方面指出“每个社会形构都建构客观的空间与时间概念,以符合物质与社会再生产的需求和目的,并且根据这些概念来组织物质实践(material practice)”。[4]在哈维看来,在现实的空间结构中,社会正义能够真正敞开并构成克服空间剥削和空间异化的规范性原则。只有在社会过程的流动性与空间形态的固定性的辩证关联中以及在普遍性质正义理论和特殊性质正义理论的相互融合中,社会正义才能嵌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环境,蕴含历史情境性特征的社会正义才能被把握。

哈维语境中的社会正义之所以能够成为构思“空间解放”的规范性原则,不仅在于“空间解放”构思以社会正义为特定评价机制,更在于社会正义和“空间解放”之间的共生关系。第一,社会正义能够成为衡量“空间解放”构思的特定的评价机制,这使得它成为“空间解放”构思规范性原则的逻辑前提。为了扬弃永恒价值和金钱至上的僵化评价机制,哈维强调,“在我看来,用对‘评价过程’的理解来代替僵化的‘价值’观念,可以解决这些难题”。[5]在运用“评价过程”方法时,哈维把问题焦点置于社会正义之上,将社会正义的“评价过程”视为关于“空间解放”构思的特定评价机制。基于“评价过程”的特定评价机制,社会正义能够赋予“空间解放”构思以价值合理性,为摆脱资本积累逻辑的空间解放提供规范性支撑。同时,作为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的空间表达,“空间解放”构思也需要社会正义为解放性变革提供特定评价机制,以在不平衡地理发展中呈现自身的价值。第二,社会正义和“空间解放”之间的共生关系体现了社会正义作为“空间解放”构思的规范性原则的内在依据。“空间解放”和社会正义具有相互依存的本质关联。哈维认为社会正义不是既定社会形态之外的彼岸性质的观念,而是居于历史空间之内的普遍性力量。社会正义和“空间解放”共处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空间秩序之中,即孕育社会正义复苏潜能的历史地理环境也包含着“空间解放”的诞生条件。同时,“空间解放”的过程和社会正义的复兴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空间解放”为社会正义提供地理空间,社会正义构成“空间解放”的规范指引。哈维以北卡罗来纳州火灾事件中的“政治无能”现象为历史语境,分析空间剥削和社会正义缺席之间的同质关系,并将“空间解放”的过程和社会正义的复兴置于反资本主义政治的历史实践中。

作为“空间解放”构思的规范性原则,社会正义对社会支配体系之外各种“残余”或“边缘”部分、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和辩证乌托邦理想、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和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的三重理论进行综合,这为“空间解放”构思奠定了理论基础;社会正义从价值评价、理论动员、政治承诺方面明确了“空间解放”构思的地理坐

标、历史动因、乌托邦机遇,指明了“空间解放”构思的基本方向。

哈维语境中的社会正义对“空间解放”构思的理论奠基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社会正义对社会支配体系之外各种“残余”或“边缘”部分的综合,构成了“空间解放”的变革地点的构思。相比于后现代主义者将“空间解放”的变革地点确定为独立于社会支配体系的“残余”或“边缘”部分,例如福柯将变革问题的焦点置于身体之上,以身体作为抵抗政治学的现实出发点,哈维认为整个社会中的各个环节都具有解放空间的潜质。社会正义则是社会支配体系之外各种“残余”或“边缘”部分能够相互关联的重要媒介。通过赋予各种“残余”或“边缘”部分以规范性原则,社会正义在自然地理差异的基础上融合不断扩大的空间隔阂,使不同地方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联结起来,将“空间解放”的变革地点落实在统一于社会整体的各个环节之上。第二,社会正义对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和辩证乌托邦理想的综合,呈现了“空间解放”的整体视野的构思。社会正义在现实形态上内在于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之中,并作为规范性原则在运动中发挥着政治动员作用,调和各种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以围绕解放空间的理论目标展开实际的斗争活动。在此意义上,社会正义不仅是既定社会空间秩序的理论反映,也是哈维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价值反思。在对不平衡空间结构的价值反思中,哈维致力于寻找社会正义意义上的社会空间秩序,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地形上绘制辩证乌托邦理想的地理结构。正是在对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和辩证乌托邦理想的共同图绘中,社会正义显明了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整体视野的构思。第三,社会正义对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和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的综合,展现了“空间解放”的地理转型的构思。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在历史过程的发展中迷失于社会过程的无限开放性,偏离了地理转型的既定目标。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在无时间线索的空间中达到“空间解放”的地理转型,却由此束缚于“空间游戏”的封闭性中。作为立足于不平衡地理发展中的规范性原则,社会正义是缓和两种乌托邦理想之间张力的现实力量。在社会正义的融合作用下,相互外在的社会过程乌托邦和空间形态乌托邦得以辩证地彼此关联起来,共同致力于“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以彰显对“空间解放”的地理转型的构思。

在奠定“空间解放”构思的理论基础的过程中,哈维语境中的社会正义从价值评价、理论动员以及政治承诺维度为“空间解放”构思指明了基本方向。社会正义从价值评价方面明确了哈维构思“空间解放”的地理坐标。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萌发于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而“‘社会正义’作为一种价值理念须对特定样态的空间生产进行价值评价”。[6]作为反资本主义斗争的最好的评价地形,社会正义一旦在既定空间秩序中获得现实力量,就将成为揭示资本生产关系中空间障碍的重要评价支点。社会正义对空间障碍的揭示也表征出“空间解放”构思需要社会正义发挥价值评价作用,赋予自身具体的地理坐标,在非正义性的社会生产关系中确定自身的空间定位。社会正义从理论动员角度凸显了哈维构思“空间解放”的历史动因。针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哈维以社会正义的理论动员作用呈现“空间解放”的历史动因——资本积累逻辑对空间生产的驯化。在资本生产过程中,“铁路和公路的大规模建设,就是进行空间征服和改造的基本技术”。[7]对于空间差异增殖的非正义性,社会正义在理论动员过程中整合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中的不同力量,使得战斗的特殊主义运动和全球化的集体行动在相互关联中共同致力于“空间解放”的历史运动。社会正义以政治承诺的方式明晰了哈维构思“空间解放”的乌托邦机遇。相较于重视局部化抵抗策略的激进乌托邦思潮和坚持“亲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幻想的右翼乌托邦理想,由社会正义生成的时空乌托邦理想在“空间解放”构思中显现为更具有历

史可能性的政治承诺,它既作用于现实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又能够明确哈维构思“空间解放”的乌托邦机遇。因为在哈维看来,构思“空间解放”的关键不是按照普遍的正义原则对不同的地理结构作出明确判定,而是在既定的空间情境中凭靠社会正义的动员力量,将时空乌托邦理想置入不同空间规模中的政治运动,以明确“空间解放”的乌托邦机遇。

哈维语境中的社会正义生成于不平衡的社会空间秩序,是具有历史情境性特征的规范性原则。社会正义之所以成为“空间解放”构思的规范性原则,既在于社会正义形成了衡量“空间解放”构思的特定评价机制,也在于社会正义和“空间解放”的共生关系。社会正义对“空间解放”构思的规范性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正义对社会支配体系之外各种“残余”或“边缘”部分、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和辩证乌托邦理想、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和空间形态乌托邦理想的三重综合。社会正义为“空间解放”构思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从价值评价、理论动员和政治承诺方面指明了“空间解放”构思的基本方向。

二、哈维构思“空间解放”的三重路径

在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原则作用下,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获得了具有规范意义的理论基础和方向坐标。依据“空间解放”的思想生成、现实必然性和目标指引,哈维阐述了构思的具体内容。经由对激进乌托邦思潮的超越,哈维展开了对“空间解放”思想生成的构思;通过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关注,哈维明晰了对“空间解放”现实必然性的构思;在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哈维形塑了对“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构思。

在超越激进思潮的乌托邦理想的过程中,哈维展开了对“空间解放”思想生成的构思。在现代性的持续推进中,资本主义社会表现出新特征、新面貌,而齐一化、同质化的生活样态成为社会批判的重要对象。在资本积累逻辑主导的空间生产中,如何缓解人们的生存意义危机、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成为人们的共同难题。面对时代难题,以福柯、拉康、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为代表的激进思潮的乌托邦理想者凭借对独立于社会支配体系的异质因素的关注,主张采取局部化抵抗政治策略,立足于社会过程之外的“残余”或“边缘”部分,对抗启蒙理性支配社会整体的统治逻辑。但是地域性抵抗策略无法整合不同空间规模中的“残余”或“边缘”部分,未能在激进乌托邦理想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之间展开解放政治学的历史实践。对于哈维来说,当被置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处境时,“空间解放”思想生成的构思在解放政治学的语境中明确了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的现实表达。在构思过程中,哈维借助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原则将“空间解放”的思想生成从实证主义方法的视野导向马克思主义的语境,坚持并重构了马克思对资本积累逻辑的批判。哈维认为尽管实证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相似性,但二者的“本质的区别是,实证主义仅仅是为了理解世界,而马克思主义试图改变世界”。[8]借助实证主义方法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相互比较,哈维认为“地理学不可能绝对中立,也绝不应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之中,它必然受到其他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9]通过将“空间解放”的思想生成嵌入资本生产中的空间剥削过程,哈维的构思否定了启蒙逻辑中的普遍性主张,拒绝了激进乌托邦理想中的地方化策略,从空间维度澄明了解放政治学的历史面貌,展现了对“空间解放”思想生成的构思。

凭借对资本主义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嵌入,哈维明晰了对“空间解放”现实必然性的构思。作为哈维把握社会地理环境的理论武器,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穿梭于不同的空间形态,确证了资本积累逻辑中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表明了构思“空间解放”现实必然性的历史地理环境。经由对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嵌入,哈维从相互关联的四种理论视角展开了对“空间解放”现实必

然性的构思。一是全球化空间视角,即空间生产的地理错位。“资本日益增加在地理上的流动”[10]使得全球范围内的空间生产以全球化的方式被持续纳入资本生产过程,形成了全球空间生产地方化和地方空间生产全球化的地理错位现象。在资本的剥夺性积累中,全球范围内空间生产日趋集聚于地方,降低生产的空间费用;地方化空间生产被赋予全球性意义,内蕴于其中的空间非均衡性的全球化拓展得到深化。二是城市化空间视角,即同质化空间结构和等级化空间秩序共存的地理布局。“资本主义工业城市不仅是一台产生不平等和不公正的机器,也是一个产生危机的导火索”。[11]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拓展中,资本城市化过程将消除空间生产中的异质因素,呈现出同质化的城市空间结构。而在具体的空间布局过程中,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空间博弈赋予城市空间不同的地理面貌,显示出等级化的城市空间秩序。三是自然空间视角,即环境问题的地理空间转移。“资本主义对生态危机的空间转嫁,极大地破坏了贫困阶层和发展中国家的生态环境,从而引发了当前环境正义运动的广泛兴起”。[12]自20世纪晚期以来,环境管理的“标准观点”、生态现代化看法以及“明智利用”观念等倾向于在资本生产关系中借助不同空间规模之间的转移活动缓解环境问题造成的空间负担,但未能给予环境问题实质性的解决策略。四是后现代视角,即“时空压缩”的紧张体验。在对后现代体验的关注中,哈维借助从福特主义到灵活积累的形式变化,确证了后现代处境中“时空压缩”的特殊体验。资本生产过程“通过时间消灭空间,已经彻底改变了进入日常再生产的商品的混合”。[13]“面对行车时间缩短的世界,空间关系被急速压缩,巴黎人因此感到手足无措”,[14]陷入“时空压缩”的紧张体验之中。

作为“空间解放”思想生成和现实必然性构思的深化,哈维经由时空乌托邦理想的地理学想象,形塑了对“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构思。在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过程中,乌托邦理想是“空间解放”的具体的希望归属,“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15]对于乌托邦理想何以可能的问题,不同于福柯语境中的异托邦(heterotopia)、奥威尔构建的歹托邦(dystopia),哈维把乌托邦理想置于对资本生产关系的空间批判中,赋予乌托邦理想以历史属性。在拒绝启蒙理性的宏大叙事时,哈维将乌托邦理想嵌入不平衡的地理发展环境,在历史的空间秩序中建构乌托邦理想的具体方案。对于乌托邦理想如何显现的问题,哈维在借鉴马克思革命想象力的基础上引入地理学想象。在地理学想象过程中,通过对传统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和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的扬弃,哈维依靠对既定社会空间结构的历史嵌入,将“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构思定位在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之上。在对“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具体构思过程中,哈维认为任何乌托邦理想的尝试都应立足于具体地理环境中的空间问题。一方面,以托马斯·莫尔《乌托邦》为代表的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设定了理想社会的稳定和谐,但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仅仅是孤立的、自我封闭的空间构造,将时间—历史原则置于社会—空间原则的对立面,否定了社会发展中的过程辩证法。另一方面,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迷失于社会过程的不断延伸,在无限的历史选择中偏离了解放空间所需的确定立足点。在哈维看来,“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构思既要避免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的封闭性,也要克服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的无限开放性。作为两种乌托邦理想的替代选择,嵌入资本主义地理环境中的时空乌托邦理想,既反映了不平衡地理发展的历史趋向,又表明了乌托邦理想的特定地理机遇,为哈维对“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构思提供了理论选择。

在对“空间解放”思想生成、现实必然性以及目标指引的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哈维呈现了“空间解放”构思的三重路径。相较于激进思潮乌托邦理想中既定社会空间维度的理论缺失,哈维依靠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批判,完成了对

“空间解放”思想生成的构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空间批判中,哈维从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自然空间和后现代体验等视角展现了“空间解放”现实必然性的构思。经由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分析,哈维先后拒斥空间形式乌托邦理想和社会过程乌托邦理想,将对“空间解放”目标指引的构思落实在重振时空乌托邦理想之上。

三、哈维“空间解放”构思的理论得失

哈维从思想生成、现实必然性与目标指引等方面,完成了对“空间解放”的构思。三重路径的构思对于丰富人的解放的空间意蕴、拓展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内涵以及凸显构思方法的原则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价值审视下,哈维的构思在处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劳动分工的联结作用和社会正义的综合作用两对关系时逻辑错位的理论不足也体现了出来,难以作用于社会空间秩序的实际变革。

在“空间解放”的构思内容上,哈维丰富了人的解放的空间意蕴。相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中历史—时间维度的人的解放,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突出了人的解放的社会—空间维度。在以马克思的理论资源为空间批判奠定方法论基础和价值立场时,哈维从空间视角重塑了马克思对人的解放探求。哈维没有把人的解放视为局限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发展过程,而是在辩证的和历史的地理唯物主义视野中深化人的解放的空间向度,将人的解放整合进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空间批判之中。相对于早期空间理论对人的解放的分析,哈维从不同方面呈现了人的解放的理论维度。当把空间批判研究置于对资本主义城市的分析中时,列斐伏尔以“城市权利”作为理论基础,将城市视为寻求人的解放的立足点。哈维则在全球化空间、城市化空间、自然空间和后现代体验等多个维度揭示人的解放的空间面貌,展现了不同空间规模中人的解放的历史样态。相对于激进乌托邦思潮对异托邦、歹托邦等的理论侧重,哈维以重振乌托邦理想作为“空间解放”的目标指引,明晰了人的解放的未来向度。在激进乌托邦思潮对当下社会替代方案的分析中,异托邦、歹托邦等正在取代乌托邦理想,成为对抗“右翼乌托邦理想”的主要选择。哈维则在“空间解放”构思中,基于对历史空间秩序的批判,将人的解放置于重振乌托邦理想之中,明确了人的解放的未来方向。此外,哈维的构思也拓展了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内涵。哈维认为“解放政治的构想需要地理学知识的批判性建构,需要在理论上对资本主义空间生产和不平衡地理发展进行反思与规划”。[16]作为人的解放任务的历史承担者,无产阶级及其革命运动是实现人的解放的现实基础。为了回答全世界的无产者如何在不平衡的社会空间环境中联合起来的问题,哈维以重建阶级和先锋政党为中介,从三个方面对解放政治学作出了理论拓展,以空间规模、地理差异的生产为历史契机,从空间不平衡的角度奠定了解放政治学的地理基础;以社会正义对不同空间形态中反资本主义力量的综合作用,丰富了解放政治学的实际策略;以时空乌托邦理想作为“空间解放”的目标指引,明晰了解放政治学的未来趋向。

“空间解放”的构思内容是通过特定的构思方法展示出来的。在依据社会正义的规范性和嵌入不平衡地理空间的历史性的基础上,哈维突出了构思方法的原则性。相较于后现代主义者对“特殊主义正义理论”的重视,哈维坚持社会正义的地理情境性特征。借助具有历史情境性的社会正义,哈维赋予“空间解放”构思以方法上的规范性。以社会正义为方法论指引,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才得以在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空间结构中展开自身理论建构,而不是迷失于资本积累逻辑营造的空间秩序之中;相较于激进政治学对历史地理环境的边缘化处理,哈维将“空间解放”构思嵌入不平衡地理发展的空间秩序之中,以突出构思方法的历史性。在哈维看来,“空间解放”的构思内容和构思方法不是相互外在

的,而是彼此归属,呈现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图景,并共生于不平衡地理发展环境。当激进政治学着眼于社会支配体系之外的“残余”或“边缘”部分,坚持局部化抵抗策略时,哈维倾向于在不平衡地理发展之中探寻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以表明构思方法的历史性质。在社会正义赋予的规范性和嵌入不平衡发展环境的历史性的基础上,哈维呈现了构思方法的原则性,即不仅具有构思方向上的规范性,也有构思基础上的历史性。

哈维的构思虽然深化了人的解放的空间向度,凸显了方法论上的原则性特征,但在分析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劳动分工的联结作用和社会正义两组关系时仍有逻辑上的错位问题。就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之间的逻辑错位而言,哈维以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的策略主张遮蔽了变革资本生产关系的根本要求。资本积累是不平衡空间结构的形塑过程,“资本是塑造空间形式、推动空间生产转换的根本力量”。[17]“哈维的目标正是要在空间问题上回到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强调,即革命的和批判的性质”,[18]在变革资本生产关系的过程中,将空间生产从资本积累的创造性破坏中解放出来。然而哈维把如何摆脱资本积累逻辑、实现“空间解放”的问题纳入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之中,没有继续围绕变革资本生产关系进行论证。哈维试图依据空间维度中的解放政治学理论,在不同空间规模的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中,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方案。就劳动分工的联结作用和社会正义的综合作用之间的逻辑错位来说,哈维以社会正义对各种反资本主义力量的综合作用取代了劳动分工对社会各个环节的联结作用。在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的变革地点的问题上,哈维拒斥了激进政治学对社会支配体系之外的“残余”或“边缘”部分的侧重,坚持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存在于社会的各个环节,“每一环节都充满了变革潜力。因为劳动分工在不同环节间不平衡地分配”,[19]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劳动分工的作用下,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分布于社会的各个环节。但是在如何将不平衡地理环境中的各种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的问题上,哈维没有坚持劳动分工联结社会各个环节的分析思路,并且排除了马克思主义中的先锋政党作用,只是凭靠社会正义的综合作用整合各种反资本主义政治力量,将解放空间的现实目标置于社会正义的综合作用之中。

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之所以产生并受限于上述逻辑错位,不但在于哈维对纯粹“生产主义”的不恰当批判,而且在于哈维将转变生产方式视为物种潜能的重新组合。

首先,在批判纯粹“生产主义”的过程中,哈维偏离了资本关系中的生产环节,把理论重心置于资本活动的非生产环节中。针对“内部关系”学说的现实运用的问题,[20]哈维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教旨主义的”或“经济决定论”的解读模式正是“内部关系”学说的现实运用。“原教旨主义的”解读模式把资本活动中的非生产环节(分配、交换、消费等环节)内化在生产环节之中,将生产环节视为“内部关系”学说中的封闭场所,而不是资本活动中的敞开环节。相比于主张生产环节封闭性的单子论解读模式,哈维对生产环节采取“在过程中研究‘环节’”的解读方式。即使生产环节具有优先于其他环节的重要性,哈维强调“研究这些其他环节(如消费)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方式(最明显的例子是,消费者的联合抵制影响生产行为)”。[21]当单子论模式把生产环节视为内在化的封闭环节,陷入纯粹“生产主义”的泥淖之中时,哈维依据“在过程中研究‘环节’”的解读方式,避免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纯粹“生产主义”解读模式,但把理论重心置于资本活动的非生产环节中。在马克思扬弃纯粹“生产主义”的意义上,哈维的构思未能真正克服对生产环节的单子论解读模式。哈维指出,“我并非打算放弃把转变生产方式视为基本目的的主张,但是如果局限于此,而未能关注消费、分配和交换在这个世界中的意义,我们将会失去一

种政治驱动力量”。[22]对纯粹“生产主义”的批判使得哈维淡化生产环节的基础地位,转而以社会正义的综合力量寻求“空间解放”构思的具体实现。但在生产方式变革缺失的情况下,社会正义无法凭靠自身的理论动员作用对空间秩序的转变产生实际影响。此外,在内含着人的解放的历史地理环境中,“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23]这并不意味着生产环节将非生产环节(分配、交换和消费等)内化在自身之中,也不能表征生产环节的革命化足以引发人的解放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24]无论是纯粹“生产主义”的狭隘主张,抑或是对生产环节的理论偏离,都只能将马克思播下的“龙种”贬低为“跳蚤”,将人的解放的现实任务局限在“解释世界”的理论演绎中。

其次,哈维将转变生产方式视为物种潜能的重新组合,这使“空间解放”构思难以在空间结构的转变中产生实际的理论作用。在论及资本主义社会的多元替代选择时,哈维指出作为物种的人类与其他动物都具有“类存在”意义上的先天能力,并能够借助潜在的物种能力改造环境、满足自身的生存与发展。[25]“空间解放”过程中生产方式的转变则被哈维把握为物种潜能要素的重新排列,“如果资本主义不以某种方式配置所有的技能就不能生存,那么社会主义的任务就必须是从基本技能的内部找到所有要素的不同结合”。[26]在资本主义社会替代方案的分析中,哈维把生产方式置于物种潜能中加以把握,并以各种基本技能的重新组合分析生产方式的转变。因而,当资本主义社会替代方案被视为物种基本技能的重新组合而不是生产方式的变革时,寻求摆脱资本积累逻辑的“空间解放”构思也就难以作用于社会空间秩序的实际变革。在马克思人的解放要求变革生产方式的意义上,哈维对生产方式及其转变的认知是先验性质的。哈维将“空间解放”中生产方式的转变表述为人性中物种潜能的重新组合。但生产方式并不建立在物种的基本技能之上,而是在“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中获得阐释,“更确切地说,它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命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27]生产方式的变革也未能在物种潜能的重新组合中得到历史的说明。在人的解放进程中“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28]生产方式的变革内蕴于生产力的发展之中,只有在生产力的社会发展中才能得到彻底的解释。当生产方式及其转变被内置于物种的基本技能中时,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也就无法转化为社会空间秩序变革的现实推动力。

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丰富了人的解放的空间意蕴、拓展了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内涵、凸显了构思方法的原则性。但在马克思人的解放理论的价值审视下,哈维的构思显现出在处理资本主义空间剥削和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劳动分工的联结作用和社会正义两组关系时的逻辑错位。逻辑错位的关键不但在于哈维对纯粹“生产主义”的不恰当批判,而且在于哈维将转变生产方式理解为物种潜能的重新组合。对资本积累逻辑中生产环节的偏离使得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难以实现从“不平衡地理发展”到“公正的地理差异的公正生产”的现实目标,只能是停留于空间秩序变革之上的理论设想。

围绕对“空间解放”的构思,哈维借助具有历史情境性的社会正义,赋予构思以规范性原则。在社会正义的规范作用下,哈维依据“空间解放”的思想生成、现实必然性与目标指引,展开了具体的构思过程。三重路径的构思对于丰富人的解放的空间意蕴、拓展解放政治学的空间内涵与凸显构思方法的原则性具有重要意义。但双重的逻辑错位问题,使得哈维的构思难以真正作用于社会空间秩序的实际变革。哈维对“空间解放”的构思提示人们在面对哈维的相关论述时,不能不加反思地进行引用与效仿,而应在辩

证分析的基础上把握其思想本身的合理性和价值性。以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对诸如哈维等西方学者的理论资源作出批判性借鉴和反思性审视，切中肯綮地剖析与领会人的解放的历史原像，无疑是一项亟需持续深耕的现实任务。

注释：

〔1〕在《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希望的空间》等文本中，哈维立足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地理环境，以空间生产摆脱资本积累逻辑的束缚为理论轴心，展开了对“空间解放”的理论构思。哈维将地理学因素融入解放政治学之中、对资本生产过程进行空间批判、从空间维度重塑马克思的人的解放理论，凸显了“空间解放”在社会地理环境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参见王雨辰、高晓溪：《空间批判与国外马克思主义解放政治的逻辑》，《哲学研究》2016 年第 11 期；任政：《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6 期）。笔者认为，“空间解放”思想在哈维的空间理论中具有基础性意义，包含着哈维对不平衡空间秩序的批判、对反资本主义政治运动的理论动员以及对乌托邦理想的重塑等内容。无论是哈维对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的建构，还是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替代方案的分析，都能够在“空间解放”思想中得到贴近的理论反映。

〔2〕〔8〕David Harvey,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Marylan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5, 129 – 130.

〔3〕罗岗主编：《帝国、都市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208 – 209 页。

〔4〕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年，第 377 页。

〔5〕〔19〕〔21〕〔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12、121、85 页。

〔6〕李春敏：《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哲学动态》2012 年第 4 期。

〔7〕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9 页。

〔9〕崔丽华：《大卫·哈维空间理论的三个视角》，《南京社会科学》2019 年第 11 期。

〔10〕〔美〕大卫·哈维：《新自由主义简史》，王钦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年，第 105 页。

〔11〕〔美〕爱德华·W·苏贾：《寻求空间正义》，高春花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第 86 页。

〔12〕张佳：《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探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 1 期。

〔13〕〔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对文化变迁之缘起的探究》，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 375 页。

〔14〕〔美〕大卫·哈维：《巴黎城记：现代性之都的诞生》，黄煜文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 123 页。

〔15〕〔26〕〔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183、207 页。

〔16〕董慧：《身体、城市及全球化：哈维对解放政治的空间构想》，《哲学研究》2012 年第 4 期。

〔17〕任政：《资本、空间与正义批判——大卫·哈维的空间正义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4 年第 6 期。

〔18〕胡大平：《哈维的空间概念与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社会科学辑刊》2017 年第 6 期。

〔20〕为了将自身的过程辩证法和伯特尔·奥尔曼（Bertell Ollman）的“内部关系”辩证法区别开来，哈维借用了莱布尼茨单子论的理论资源。因为在哈维看来，莱布尼茨是“内部关系”学说的奠基者，并且对奥尔曼的“内部关系”辩证法产生了影响。在对莱布尼茨的单子论的理论分析中，哈维认为莱布尼茨虽然为德国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也留下了尖锐的问题：“如何在实际事务中运用内部关系的学说？”（〔美〕大卫·哈维：《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胡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年，第 83 页）正是在回答“内部关系”学说的现实运用问题时，哈维展开了对纯粹“生产主义”的批判。

〔22〕David Harvey, *Spaces of Capital: Towards a Critical Geography*, Edinburgh: Routledge,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8 – 19.

〔23〕〔27〕〔2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519、520、602 页。

〔2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8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 23 页。

〔25〕哈维将物种潜能要素归结为：生存竞争和斗争、适应生态环境、改造环境、安排空间秩序和安排时间秩序等方面。这些因素是作为“类存在”的人无法摆脱，且必须依赖的基本技能。为了区分传统社会主义革命的“总体转变”模式，哈维从人之物种的基本技能出发，将生产方式的转变视为各种物种潜能的重新排列组合，为“空间解放”提供具有多种可能性的策略选择。关于如何构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问题，哈维认为“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重组全部技能的要素”（〔美〕大卫·哈维：《希望的空间》，胡大平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 208 页）。

〔责任编辑：汪家耀〕